

李龙牧 著



五四时期思想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五四时期思想史论

李龙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若海

责任校对 陆宏光

五四时期思想史论

李龙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大丰县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1 字数 345,000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309-00489-2/K·22

定价: 5.30 元

657.55.67

出版说明

五四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如短暂的一瞬。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划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从旧民主向新民主的转变，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的第一页。从政治思想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必然结果。本书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及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力求说明各种思潮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出现的原因和意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现将此书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往何处去？	1
一、此路不通	1
二、早年的陈独秀	5
三、迷茫中的革命党人	8
四、李大钊的箴言	13
五、中国往何处去？	19
第二章 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初展	24
一、逆流	24
二、《青年杂志》的方针	28
三、陈独秀的思想武器	33
四、补课式的启蒙运动	38
五、艰难的起步	44
六、并非最后的“最后觉悟”	49
七、前进中的李大钊	53
第三章 历史的幽谷	59
一、动荡	59
二、依恋与决裂	63
三、关于孔教问题的争论	67
四、序幕由此揭开	71
五、胡适其人	77

六、“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	83
七、旧政治的迷途	91
八、旧民主主义走到了谷底	96
第四章 曙光在前	101
一、新机	101
二、“遵命”的主将	105
三、葫芦里装的药	110
四、进一步的决裂	115
五、势将分化的战线	121
六、新生代	126
第五章 新文化的形成	133
一、十月革命与中国	133
二、一出双簧戏	137
三、破旧与立新	141
四、科学与迷信的斗争	148
五、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53
六、成长中的新生代	158
七、赤旗初展	163
八、新文化与新民主	168
第六章 百家争鸣	177
一、向高潮的发展开始了	177
二、新旧对垒	182
三、新形势下的无政府主义	188
四、特殊的同盟者	195
五、新旧思潮的大激战	200

六、隐然的对立趋向·····	205
七、这个时代的百家争鸣·····	211
第七章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	220
一、世界新形势下的中国·····	220
二、东方的觉醒·····	224
三、火炬在天安门前点燃·····	230
四、伟大的“六三”运动·····	236
五、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241
六、历史的新页·····	245
七、新政治在前进·····	252
第八章 发展和分化·····	259
一、新思潮在发展中·····	259
二、全国性的高涨·····	268
三、新政治的同盟军·····	274
四、左右分趋的开始·····	282
五、哲学与政治·····	288
六、一种独特的趋向·····	296
七、陈独秀的转变·····	302
八、在斗争中成长·····	308
第九章 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运动·····	317
一、国际和中国·····	317
二、第一个建党筹备组织·····	322
三、《新青年》的新发展·····	328
四、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开始·····	335
五、有力的开局·····	341

六、《共产党》和建党准备·····	347
第十章 思想论争和共产党的成立 ·····	354
一、鱼目混珠·····	354
二、划清思想界线·····	360
三、大论战的实质·····	366
四、东方文化派的出现·····	373
五、东西文化问题·····	380
六、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387
七、从新文化到新政治·····	394
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01
循着历史的道路前进 ·····	408
后记 校后再记 ·····	417

第一章 中国往何处去？

一、此路不通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中的一部分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接着，南方一些省和个别北方省份先后响应，宣告独立。一时间，革命迅速扩大，带上了一定的全国规模。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组成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看来是成功了。

但这个革命实际上很脆弱。多数省份还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而革命派却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时，清王朝的实际权力落在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手里。他紧紧抓住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北洋陆军，用作乘机窃取统治权力的主要支柱。一面利用清王朝除依靠他之外别无足以对抗革命的力量，逼宣统退位，把权力让给他；一面利用革命派的软弱性，表面上接受共和制，以此为条件，逼民军让他当大总统，以便集南北权力于一身。资产阶级不能运用初步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发动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懂得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多数人主张与袁世凯妥协，以为只要让他当“华盛顿”，用这种方法实现南北统一，就可以巩固中华民国，取得各国承认。于是，经过谈判，2月，清帝宣告退位，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同时，孙中山辞职，以便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指使下属发动兵变进行胁迫，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决定迁都，搬到受封建势力控制的北京。

接着，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算是结束了。人们以为，中国已经在中华民国的国号下实现了“统一”，连袁世凯也算和大家一道“咸与维新”了。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几千年的帝制终于被废除，这是很大的功绩；但让袁世凯窃取权力这种结局，却不免使人啼笑皆非。资产阶级以为既然民国的国号已经被承认，政权已掌握在汉族人手里，革命就算成功了，那实在是幼稚的。他们不懂得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政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事实是：中华民国才降生不久就变成了袁世凯的国家。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虽然已经推翻了，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的统治仍然主要代表依附于东交民巷洋大人的封建地主阶级，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南北统一”、“咸与维新”，严格地说，不过是统一于反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实际上是失败了。

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趋向逐渐明显。孙中山并不赞成这样的妥协，但他拗不过那些赞成妥协的多数人，只得实行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前，1912年3月11日，他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赶急公布了《中年民国临时约法》，宣称用以暂代宪法，想借此约束袁世凯的野心。这是一个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力求坚持共和制度的文件。但是法典的空文并不会自然地变成实际权力。孙中山的做法表明，他既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便不能不寄希望于用约法的条文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这只能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至于那赞成妥协的多数，就更明显地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部分人干脆另立政党，实行分裂；另一部分人也以为既然已经成立民国，公布约法，议会政治就可以实现了。从此，只要接下去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党的地位，掌握了国会，就可以实现责任内阁制，靠这种政体形式来钳制袁世凯，并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多少是把民主共和国这种政体形式当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的。11月，在这

些人主持下，宣告解散同盟会，另行改组成立国民党。为了争取选票，不惜放弃原则，大批拉人入党，几乎把这个可以当之无愧地代表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蜕化成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党。那些热衷于这样做的人，是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中国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的。

问题是这条路能走得通么？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统治权力的结果。这种政体既保证了不同于封建统治的一定的民主性，又便于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和集团间进行权力分配。但是，我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场革命中并没有真正掌握住统治权力，只靠政体形式便不可能实现民主，搞政党政治也只能演成一出滑稽剧。那些以为实行共和制就可以致中国于民主、并为此而奋斗的政治家们，其主观意愿自然值得肯定，但他们既然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便多少离开了革命道路而只在政体上下功夫，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当成万应灵方，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比19世纪中叶德国的资产阶级更强大有力，其所遇到的对手在狡诈和凶残上却可以说更甚于那时的普鲁士王室和贵族，何况这个对手的背后还有自称“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呢？对于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的评价，自然应该与1848年的法兰克福政治家有所区别，但就他们当年信奉的政治方案说，称之为中国式的“议会迷”其实并未必过分。

事实上，袁世凯当然不会遵行民主共和国方案。1913年初，国会即将开会，国民党成了第一大党，宋教仁全力以赴，积极活动，满以为不久就可以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通过责任内阁制掌握权力了。可是，就在3月20日，袁世凯派遣特务在上海把他暗杀了。这桩罪恶行为出自袁的黑手就在当时也是十分清楚的。孙中山愤然主张反击；那时，国民党还掌握着南方几个省的政权，如果揭露袁世凯的真实面貌，坚决反击，未始不能据以号召群众。

可惜，这个党中的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议会活动中。于是，“宋案”不了了之；4月8日，国会开会。资产阶级革命既然已经半途而废了，议会制度的空壳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袁世凯任凭议员们在国会讲坛上大发高论宏议，自己却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消灭国民党的势力。7月初，他布置已定，便下令调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由国民党人充任的都督职务。直到这时，国民党才被迫匆匆发动了一个反袁起义，自称为“二次革命”。但是，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袁世凯的刀早已磨好，他立即下令“讨伐”，很快就用武力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在这次事变中，原来本是辛亥革命对象的袁世凯竟然以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统的面目出现，而本来称得上是革命元勋的人反倒被说成是破坏“民国”的罪人。革命胜利还不到两年竟发生了这样的人妖颠倒，还有什么比这更加严酷的历史嘲弄呢？

“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的其他一些人都不能不狼狈地逃往海外。这可以说是终结了辛亥革命由成功到失败的全过程。就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次似乎造成了燎原之势的带全国规模的革命，转眼间烟消火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需要的。但中国革命的敌人远比西方当年的封建统治者强大，而民族资产阶级却远比西方更软弱，他们并没有能力像西方国家那样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然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胜利，却又只知从政体形式上仿效西方，以为只要有了议会制，就可以使自己掌握权力，其结果是不可能不失败的。人们可以承认他们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愿望是可敬的，但不能不从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中接受教训。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此路不通”的路牌实际上已经横在他们面前了。

二、早年的陈独秀

在经历过“二次革命”失败这个严峻教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就有稍后在五四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声名赫赫的陈独秀。他转而发动新文化运动，是受到这次教训之后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陈独秀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是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托派中人曾说，这个家庭是“安庆望族”，而且“富于资财”，在安庆、东北和北京等地的地产和商业“至少有几百万”。这个数量概念是含糊的，也容或有所夸大。不过，这终究表明，他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属于这个阶级的上层，却能从青年时起便不惜家资从事革命，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这个家庭虽然不能不在他身上留下一定的烙印，但他的勇敢的起步，无疑适合当时时代的要求而应该充分肯定。

幼年时期的陈独秀也走过科举的道路。他的家庭虽然资财丰厚，但政治地位却似乎还不能使家主们感到满足。陈的父亲在东北做过武官；在那个时代，武官的地位是低于文官、不受重视于士林的。由于父亲死得较早，他少年时代在安徽跟着孤僻得不近人情、对他又十分严厉的祖父生活。母亲则经常向他叮咛激励，说一些你父亲读了一辈子书，没有考中举人，是他毕生的憾事，你要努力争气一类的话。很清楚，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要他经过科举成名，求一个“正途出身”，以便在政治上爬上去，弥补这个家庭在统治阶级中政治地位并不很高这个缺陷。就在这种教育下，陈独秀16岁就考中了秀才，颇有点“少年成名”的样子。只是，第二年，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他从安庆到南京去参加江南乡试考举人，却名落孙山了。

那时，中国正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在陈独秀考中秀才的前一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为改良变法而积极活动。考举人落第之后的陈独秀接触到这一股时代思潮，“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今是而昨非”了^①。从此，他终于背弃自己的家庭要他走的道路，从做八股文章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思想。他的颇为用功地学习西方文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过崇奉康梁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促成了他政治立场上的转变。1901年，他在安庆演说反清，被缉捕后逃往南京，在那里结识了正在江南陆师学堂的章士钊。那正是改良派道路已走不通，革命的呼声渐趋高涨的时候。大约就是通过章的关系，他密切了和革命党人的关系。1902年，他们经上海转往日本东京留学。不久，在那里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以邹容为首的一些革命的留学生奋起剪掉了清政府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某的辫子。陈独秀曾参与其事，并因此而被遣送回国^②。

从东京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在宣传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邹容出版《革命军》，章士钊在1903年6月的《苏报》上撰文加以称扬，成为引起著名的“苏报案”的原因之一，对于推动革命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陈独秀没有这样大的作为，但为教苏曼殊学法文与他合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在译述中加入了一些革命宣传。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革命工作推广到安徽去，五月间在安庆成立安徽爱国会，努力开展拒俄活动。《苏报》被封之后，8月7日，在上海继续出版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国民日报》，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成为编辑部的主要骨干。这个报出版的时间很短，到10月13日就因故停刊了。不过，陈独秀在其中的作用却似乎比在《苏

①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新青年》二卷二号。

② 照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中说，剪辫的是邹容。不过，据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说：当时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行割发代首之憾。驯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国”。（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第229页。）

报》时大一些。他从革命派与改良派开始分道扬镳时就参加了革命的宣传工作，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904年，他在芜湖教书，并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三月底，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通俗的革命宣传。这一年，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成立华兴会，章士钊曾去参加成立会，并且担负“屯驻上海策应一切”的使命，是主要骨干之一。芜湖也属于他联络“策应”的范围，章、陈之间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安徽俗话报》在当时为数不少的通俗白话报纸中是思想水平很高的。后来合作者弃之而去，陈独秀还毅然独力艰苦支撑了一个时候，一直出版到1905年8月。他的这种表现在当时曾深得革命派的赞赏。

就在这时，华兴会和兴中会、光复会这三个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开始合并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统一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一个极重要步骤。那时，陈独秀和章士钊都不在东京，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活动是和它一致的。1906年，陈独秀由上海重新去到日本，与同盟会中人有密切接触，并完全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1909年，他由日本回国，先后在东北、上海和浙江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在杭州的陆军小学堂教书；武昌起义之后，就在那里参加了革命，以后随民军一起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和1905年在芜湖时曾一道参加革命工作的柏文蔚一起回到安庆。1912年7月，安徽由柏文蔚接任都督，成为同盟会直接掌握的省政权之一。陈独秀曾参与机要，并兼任安徽师范学堂校长（一说教育长），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处在很重要的地位^①。可惜的是革命并没有造成使他能有所建

^① 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陈独秀“曾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文蔚任安徽教育司长”，说得较含糊。查《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并没有陈任教育司长的记载。张国焘和傅斯年都说：陈是柏的“秘书长”，可能是同本人谈话中得到的印象，但《年表》中也无此记载。江苏宣告独立后一个时期，章士钊曾在程德全幕中，起草重要文件，地位很重要，但仅称“顾问”，并无正式政府职务。意者陈独秀在安徽的地位可能与此相类。

树的条件。不久，没有胜利可能的反袁“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在这次行动中做了些什么事还没有见到具体记载，但他确实是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并且和国民党的失败共命运，而且在由安庆逃往芜湖时还曾被捕过，经人营救才算狼狈地逃到了上海，饱尝了失败的苦果。

总之，陈独秀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基本上经历了辛亥革命由准备到起义成功再到最后失败的全过程。逃亡到上海时，由于一场曾经颇为轰轰烈烈的革命竟然这样快就一败涂地，使他因极度激愤而陷于悲观失望之中。他给已经先逃到了日本的章士钊写信说：“国人唯一之趋势，外人之分割耳”；甚至要章代他买书，说“急欲习世界语，为他日谋生之计”^①，似乎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中国的前途也就无望了。这种情绪自然是要不得的。但要总结这一场大变动的经验教训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刚刚遭到如此大的挫折之时说出这种话，虽然极端偏激，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由于国内不可久居，他终于也只好和许多国民党人一样，继续逃亡到日本去。

三、迷茫中的革命党人

陈独秀流亡到日本东京时，许多国民党人早已群集于此，都成了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由于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这个本来内部便包含有各种不同倾向的政党，此时实际上陷入很深的迷茫之中，在重新振作起来时也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态度。

孙中山不愧为主张民主的革命派。他本来就不满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妥协倾向和在这种倾向支配下组织起来的国民党。现在，他决定另行组织政党进行反袁斗争。不过，这时他还没有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因此只能在政治歧路上继

^① 见章士钊《甲寅杂志存稿》中《答陈独秀君》一文的附录。

续摸索前进。1914年7月，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他还没有意识到，妥协派的主要失误之一就是为急于取得“列强承认”而不惜让权于袁世凯；而袁世凯的能够篡夺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列强”的支持。不反帝，就不可能有彻底的中国民主革命。然而，按照他当时的看法，民族主义意味着“驱逐鞑虏”，推翻了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民族主义就算完成了，于是，三民主义一度变成“二民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确立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需要经过多次严酷的事实教训，此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组织上，他痛心于国民党以及原同盟会中的有些人并不和他一条心，便模仿旧式秘密会社的做法，规定凡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立文约，按指印，宣誓服从他，奉他为总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清除那些与袁世凯妥协合作的政客，那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要知道，没有彻底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想靠起誓赌咒防止野心家混进来，显然并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甚至徒然使一些本来可以支持他的人因不愿意履行这种手续而离开了他。他的这些举措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是要革命的，但此时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尽管孙中山已在重整旗鼓，但按照他当时的认识是还不可能为中国指明出路的。

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这时的行动说明，他们在政治上的迷茫甚至更有过之。这时，袁世凯由于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而自以为加强了对内的统治，便更加紧了对外的勾结，以便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1914年7月，袁政府在中英西姆拉会议上承认西藏有“自治权”。英国还企图把所谓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抢夺我国大片土地，只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才使袁世凯不敢签字。同时，欧洲大战迫在眉睫，英帝国主义也无力另在远东生事，这才拖了下来。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